

本报特派记者专访日本资深媒体人内藤康 过去还未过去，追责有益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在东京一见面，内藤康先生首先拿出一份资料，上面有一个大标题：为什么再次公开《检证战争责任》。这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主流媒体《读卖新闻》为今年策划的系列报道撰写的开篇词。

历史事实仍在讨论

《检证》一书，源自战后60年之际该报长达一年的连载报道，主题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调查。

该书2005年出版后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关注。尽管存有一些争议，但仍然被视为一种迟到的“讨论”，更揭露了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2007年该书在中国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一度成为话题。

颇为令人玩味的则是，当年主导这一罕见“反思”的竟是一家以保守立场闻名的日本大报。

今天将10年前结集出版的内容再次公开，《读卖新闻》的理由是，“又过了10年，在围绕历史认识的讨论日趋激烈的今天，把《检证战争责任》中的内容于网络上再次公开，对于思考战后70年是非常有益的素材。”

愚蠢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日本是如何走向战争的？

在内藤看来，在媒体层面对那场战争的讨论，《读卖新闻》不是个例。“NHK制作了

“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在逐渐离去。”日本资深媒体人内藤康说。

对大部分生于战后的日本国民来说，自己并没有直接参加侵略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但内藤康强调，“作为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对战争的记忆责任。”

慰安妇专题纪录片，共同社和另外几家大报也纷纷推出自己的系列报道。”尽管讨论的角度和观点各异，但他认为，这样的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这也给人一种印象：尽管日本首相宣称要“面向未来”，在日本，“过去”没有成为“过去”，仍然处于一个对历史事实的“讨论期”并且日趋激烈。

反对战争还是主流

历史问题往往是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内藤曾专门就此撰文谈日中民间感情的变化。

“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



中国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封面

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他指出，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困惑和厌倦。

在内藤看来，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他反对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质疑那种“把策动并亲自指挥了那场战争的人物，当作‘英灵’祭祀”的做法。“因为正是他们驱使众多的青年走向沙场，进而化国土为废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毁灭的边缘。”内藤反思，即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也不容将其行为正当化，更不允许日本领导人参拜。

如果说对战争历史的记忆是普通人朴

素反战思想的来源，是战后人的责任，那么如何超越情感色彩、理性客观地看待日中关系同样重要。

对于中国经常批评日本出现的右倾言论，他认为，日本国内确实出现了某种保守化的倾向，但那不是全部，更不意味着日本将重回军国主义时代。

“因为现在的日本人，没有人愿意走上战场。战争是国民不允许的。此外，和平宪法也不允许战争。”在他看来，那些媒体的不当言论恐怕与媒体商业化问题有关。

“现在一些右翼媒体认为，只要反对中国反对韩国就有市场。”内藤说，希望邻国同时看到，日本也有比较严肃地反思战争的媒体文章。他认为，大部分日本媒体人依然有这样的“良心”。

建立个人友好关系

日中两国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值得探索。

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观察者，内藤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指出，日中两国已然筑就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紧密关系，已不可能也不应该从这条路上后退。日中两国虽有矛盾，但共同利益无疑更大、更现实。

他认为，有必要为经常挂在嘴边的“日中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应该共同摸索一套顺应时代变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新的价值体系。”

“就民间层面而言，中日国民应该通过建立更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来超越抽象而生硬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概念化形象，就像鲁迅与藤野先生。”内藤认为，有个牵挂的对象，在行动上便会顾及到彼此的感情。日中之间需维持的最低限度的共识是意识到彼此互为邻国。“无论对对方有多么不满意，也无法选择远离。而对话的道路越广，就越会在意识上自觉把对方视为对等、重要的邻人。”

“听一听别的国家讲述我们的历史，这很有必要。”经济史专业出身的法比安·冯·海姆伯格来自慕尼黑，如今在中国创业。

讲述历史不能自说自话

法比安酷爱历史。在他看来，历史(History)毕竟是“他的(His)故事(Story)”，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可能讲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因此讲述历史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对待二战历史更应如此。

“有种很有名的说法，历史是由胜者写就的。”法比安认为，任何战争总是有胜负双方。“从德国人的角度来说，历史已经很清楚，正如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是可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的德国人犯下了很多错。”

他说，除了希特勒的发言史等内容外，教科书不仅讲述了德国人口中的二战故事，也穿插了战胜国一方的二战叙述。“不同的国家关于这场战争都会有不同的叙述……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仅要从德国的视角，还要从法国、波兰、犹太人的视角了解这段历史。”法比安认为，让学生了解在战时别国为何要做出某些决策、了解它们的立场是好事，也十分必要。

在法比安看来，希特勒的许多讲话的确极具煽动性，但他其实是企图借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国内矛盾。“这也是许多政府的惯常做法，通过塑造一个敌人来更好地管理本国国民。而在二战中，这个被塑造出来的敌人就是犹太人。”

历史并非单一角度解读

战后，为了改善与犹太人以及邻国的关系，德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法比安说，德法这对“百年冤家”在战后的和解，乃至在当今欧盟中紧密携手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说明和解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二战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些许阴影。

本报记者专访在中国创业的德国人法比安 要听听别人的二战叙事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德国总统高克(左)、大屠杀幸存者(中)和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走访二战遗址

“一个国家可能过去是很强大，但在未来不一定。”法比安拿拥有辉煌历史的意大利与希腊打起了比方，“看看他们现在。也许未来他们会像过去一样辉煌，但未必一定如此。德国现在的发展是很好，但未来怎样很难说。”

他认为，历史不会告诉人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单单凭着一国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来断定它在未来的角色是好是坏没有道理。

“二三十年前的欧洲，尤其是年长的人

可能会对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会联想到过去。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认为人们还会对德国抱有疑虑。人们不用担心德国会在未来用武力再次占领欧洲。”

钻研历史的法比安始终强调，历史是多面的，并非单一角度的解读能够完整展现的。“我认为没有完全正确或错误的历史叙述。当然，对于某些问题的结论是无可争议的，比如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了大量犹太人，那是德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

来的最残忍的一面。但别的国家就没有残忍的一面？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对吗？”

遗忘历史就会重犯错误

法比安认为，70年过去了，自己这一代年轻人与战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不应为二战感到内疚。看看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发生了那么多残酷的战争。你究竟选择为哪场战争而内疚？是10年前的，50年前的，还是150年前的？”

法比安认为，最好的方法不是让后人感到内疚，或因前人所做的事而感觉糟糕，而是应当让他们牢牢记住二战历史。“如果不当心、不提防，遗忘了历史，这些残忍、残酷的一面也许还会回来。”

法比安说：“如今，爱国主义情绪已经要比二三十年前，或者说战争爆发以前冷静得多。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盛极一时，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棒的，有权指挥别国该怎么做。”

“纳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本质上是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如果只是爱自己的国家，那当然没有问题。”法比安说，如果上升到觉得自己的国家就是比别国好，非要他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它不仅存在于德国存在，在法国等其他国家都存在，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